

## 尚定，《走向盛唐》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340頁。

劉健明\*

中國學者過去研究唐代文學，較多注重某些文學名家的人生態度與藝術成就，探討他們詩文的典故，考辨詩人的行事與作品繫年，而對唐代文學的發展及演變，少作整體性的探討；近年以來，新的研究趨勢異軍突起，新進的研究者不再採用傳統的研究方法，而轉向以文化史及美學的觀點來作探索，他們無論在選題、論著題目及寫作方法上，都與傳統的研究大異。本書以《走向盛唐》命名，而不作初唐詩史；討論王績、陳子昂、初唐四傑及沈佺期、宋之問等詩人時，不記述有關人物的生平及事蹟，僅論述他們在唐代詩風的發展中所作的貢獻；而在分析初唐詩時，以政治、文化演變的角度去討論，都顯示了作者追求新的路向。

本書原是作者在北京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全書以南北文化的對立與整合為楔子，討論唐代關隴文化的形成，作為分析初唐詩風的文化背景。作者認為唐初的文化，是以北方文化為主體的關隴文化；故他反駁過去的看法，以為初唐文化沒有受南方文化的影響。作者分析貞觀晚年龍朔文化變體時，也是從當時的政治鬥爭的角度加以闡釋，以為貞觀時期關隴文化強調武功忽略文治，中上層文士受到壓抑，上官儀、許敬宗、李義府等文士在太宗晚年及高宗時期與關隴集團鬥

---

\*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

爭，文士階層支持高宗冊立武則天為皇后去打擊關隴集團，龍朔詩風乃是對貞觀詩風的反動，而不僅是追求詩的形式美。及至高宗以後，進士科大盛，詩賦入仕為士人所崇尚，關隴文化走向沒落，文選學遂成為顯學。初唐四傑的特質之一在對選學的推崇，盧照鄰及駱賓王的七言詩歌，帶動了一種新文體的出現。陳子昂與沈佺期、宋之問三人的貢獻，主要表示了初唐文士的兩大詩歌理想：用健康高遠的詩歌風格取代六朝後期尤其是梁陳詩風的柔媚格調及完善詩的美感形式，陳子昂提倡風骨和沈宋講求聲律，是此個轉變的關鍵。末篇以開元十五年的意義為題，依作者的解說，盛唐的主要詩人，都在開元十五年登上詩壇，他們把中國詩歌推至黃金時代，成為盛唐氣象。盛唐氣象的實質就是風骨和聲律，重視詩歌的審美內涵與美感形式完美結合而形成的一種境界。此種境界乃是自建安以來，尤其是唐初詩人近百年的實踐的成績。本書後附三個附錄，分別是〈論文學的自覺兼議六朝文學的評價〉、〈王維詩意象兩題析英美意象派對於中國古典詩歌的誤讀〉及〈陳寅恪文化歷史主義通觀〉。本書以政治、文化變遷的角度論述初唐詩的演變，本文評論也集中討論作者所說的政治和文化的演變方面。

美國學者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大陸著作多譯為斯蒂芬·歐文) 曾撰《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sup>1</sup>論述唐代詩風如何從唐初宮廷風格轉向盛唐的直率自然。兩書相比，《初唐詩》較偏重在文學作家及其詩歌內涵的討論，特別是唐代詩風如何從南朝後期至唐初的宮廷詩風中擺脫出來，及至武后及中宗時期又再重現；本書則偏於詩歌形成及其轉變的政治、文化背景。兩書論述初唐的詩人大致相同，都討論王績、上官儀、初唐四傑、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等名家，但《初

<sup>1</sup> 賈晉華譯，《初唐詩》(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唐詩》則兼及杜審言，且在序文中表明論初唐詩應討論寒山及王梵志二家；本書沒有明確解說要討論的範圍和對象，在內容上較集中討論初唐詩歌演變的過程。在論及初唐詩與盛唐詩的區別時，《初唐詩》以為二者雖有差別，但兩個時期的詩風仍有密切的聯繫，在作者另一作品《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中，作者認為盛唐詩風是對初唐的沉默反叛，盛唐的第一代詩人都要超越初唐前輩而追慕更前的先輩，但無論盛唐詩發生了多少變化，作者以為始終沿襲初唐的詩歌傳統；<sup>2</sup>本書則以為初、盛唐詩的差異已不在美與不美，而在於完美程度或稱詩美境界上的差異(頁228)。可知《初唐詩》與本書無論在重點和論述方面都有較明顯的不同，而《初唐詩》則在要討論的範圍時有較清楚的說明。

作者撰寫本書，明確表示本書深受陳寅恪先生的撰述所影響，更表明自己折服於陳氏那「真理性的思想」(頁22)，書後附錄三〈陳寅恪文化歷史主義通觀〉專論陳先生的治史方法，顯示了作者對陳氏的推崇及取徑於陳氏的研究方法。不過本書發揮陳氏觀點時，與一般的理解有異，如作者以為：

源於胡、漢的關隴文化合為一體並最終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模式，主要決定於北周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的實施。……要之，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實施的目的即在於樹立關隴文化的正純地位，這是抗擊東南尤其是南方漢文化的「觀念」措施。……宇文泰站在以鮮卑文化為本位的角度，吸收並改造了漢族文化，形成了具有革命意義的「關中本位政策」，標志著關隴文化的完形。(頁19-20)

按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說：

<sup>2</sup>賈晉華譯，《盛唐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頁7-8。

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欲與財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藉，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別覓一塗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文化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的薰習，始能內安反側，外禦強敵。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sup>3</sup>

作者的論說是源於此說的，但寅恪先生在此沒有解說此文化的薰習，是否宇文泰已因關中本位政策而形成關隴文化，而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寅恪先生於宇文泰及蘇綽之對話後則有明確的說明：

(蘇)綽本關中世家，必習於本土掌故，其能對宇文泰之問，決非偶然。適值泰以少數鮮卑化之六鎮民族竄割關隴一隅之地，而欲與雄據山東之高歡及舊承江左之蕭氏爭霸，非別樹一幟，以關中地域為本位，融治胡漢為一體，以自別於洛陽、建鄴或江陵文化勢力之外，則無以堅其群眾自信之心理。此綽所以依託關中的地域，以繼述成周為號召，竊取六國陰謀之舊文緣飾塞表鮮卑之胡制，非驢非馬，取給一時，雖能輔成宇文氏之霸業，而其創制終為後王所捐棄，或僅名存而實亡，豈無故哉！<sup>4</sup>

可見陳先生並沒有以為關中本位政策形成了關隴文化，更沒有認為隋唐兩代續採關隴文化。初唐文化的發展，過去的研究不多，陳先生是否已有完整而系統的看法，這是引用者應注意的。同時，本書頁 86

<sup>3</sup>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15。

<sup>4</sup>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17。

注 5 以李義府案的審理是由關隴重臣李勣主持，顯示高宗時關隴勢力未曾消滅，實則陳先生在〈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已指出李勣為山東豪傑；<sup>5</sup>而〈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時亦以李勣為山東地域之代表，<sup>6</sup>可見陳氏並沒有視李勣為關隴集團人物，以李勣審理李義府案更不能說明高宗時關隴勢力未曾消滅。作者在這兩方面的論述，顯然沒有充份掌握陳先生的原意。

作者認為唐初的統治者依賴關隴集團的勢力奪取了政權，在意識形態諸方面與關隴文化保持著一脈相承的關係，這就決定了貞觀詩風的北方化傾向。（頁 23）又認為如褚亮，陳子良、庾抱，陳叔達，袁朗、劉孝孫、虞世南等出身南方的詩人，自入隋唐宮廷後，受了關隴文化的薰陶，詩風也必然有所改變，他們入唐以後的詩篇中並沒有「宮體」傾向。（頁 36）據《唐會要》卷六五〈秘書省〉記：

（貞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指太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秘書監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嘗戲作艷詩，世南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賜令繼和，輒申狂簡。而今之後，更有斯文，繼之以死，請不奉詔令。』」因顧謂世南曰：『朕更有此詩，卿能死否？』世南曰：『臣聞詩者，動天地，感鬼神，上以風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聽詩，而知國之興廢。興衰之道，實基於茲。臣雖愚誠，願不奉詔。』」<sup>7</sup>

表面看來，好像虞世南認同了關隴士人的文學觀，強調詩歌的教化作

<sup>5</sup>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17-236。

<sup>6</sup> 同上，頁 246。

<sup>7</sup> 《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1328-9。

用，更反對唐太宗撰艷情詩，但正如牟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所指出：隋唐以來，中原學人反對提倡江左文化，認為清談玄虛與淫艷詩文同為害道，讓其風氣薰染，必至主昏民弱，綱紀廢弛。在這種思想影響下，非僅南人不能置辯，即北人亦不敢公然贊成江左文化。上引文實反映了太宗因知虞世南工徐陵、庾信體，曾為宮體艷詩而令世南唱和，此事為北方諸臣所詆毀，斥為亡國之音，故太宗為保護世南，乃強調世南的方正，大事宣揚世南曾有諫他不為艷詩之行爲，而世南所為詩文則依然效法庾信體如故。<sup>8</sup>牟氏之言既注意時代的環境，復能深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所言實有道理，希望作者在論述貞觀詩風的北方化時能加參考。

作者在總結時指出：唐自開國以來，除太宗擊東突厥、破土（當作吐）谷渾之外，邊疆基本上沒有大的戰事。到了開元時期，更趨和平，然而邊塞詩恰恰在此形成創作高潮，因此作者認為盛唐時期之邊塞詩，僅是詩人借此抒發高遠的時代激情。（頁 235）按唐太宗擊東突厥、吐谷渾外，還曾東討高麗失利，平高麗事至高宗時才完成，但吐蕃的興起，對唐代經營西域已帶來長時期的壓力，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已有很深入的分析。<sup>9</sup>更重要的是，唐代自薛仁貴於大非川戰役中為吐蕃所敗後，對外改採防守的策略，邊兵需長時期的戍守，造成唐人反戰的重要原因。胡雲翼《唐代的戰爭文學》便指出初唐詩人積極主戰，一方面是北方人重意氣，另一方面則是功名的誘惑。及唐代中葉出現的非戰文學，最傾向於征怨一方面，因征戍頻年，欲歸不得，引起無窮的鄉思及無邊的閨怨。<sup>10</sup>故邊塞詩的興盛是否純

<sup>8</sup> 見牟潤孫，《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363-414。

<sup>9</sup>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sup>10</sup> 胡雲翼，《唐代的戰爭文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13-30。

是詩人要抒發時代激情，作者的分析顯然不夠全面。

總之，作者才思敏捷，能從新思路探討過去少加研究的初唐詩歌的形成與發展，是可喜的現象；但如何充份掌握前人的成果及深入探討現存的資料，或需作進一步的努力，本書僅可視為一種可喜的嘗試而已。